

## 鄭和布施錫蘭山佛寺碑漢文通解

龍村倪  
(本會會員)

〈布施錫蘭山佛寺碑〉1911 年發現，為鄭和下西洋珍貴史料。碑文以中文為主，另橫書泰米爾文、波斯文。本文勘訂中文碑文，並加以通解，聊供海內外學者參考。

關鍵詞：鄭和下西洋，布施錫蘭山佛寺碑

1911 年錫蘭（今名斯里蘭卡）在西海岸大城加勒（Galle）修路時偶然發現一塊中國石碑，碑文以中文為主，另橫書兩種外國文字。發現時碑面朝下，碑文尚清晰，中文大體可以直接解讀。因碑文啓首有：「大明皇帝遣太監鄭和、王貴通等」；碑尾紀年為「永樂柒歲次己丑二月申戌朔日謹施」字樣，學術界始知此碑乃鄭和下西洋時所立，距發現時已歷 500 餘年，實乃鄭和下西洋最珍貴的史證，一時轟動，引起國際重視，形成近代國際注目鄭和的首次高潮。

1913 年首先有學者對此碑作出說明；1914 年當時「皇家亞洲學會錫蘭分會」會長 Ponnambalam Arunachalam 爵士也即時在會中對此碑作了正式學術報告。此消息隔很久後才傳回中國，經中國學者研究，並名此碑為〈鄭和布施錫蘭山佛寺碑〉。因碑上刻有三種不同文字，故國外學者稱其為：“The Galle Trilingual Stone of Cheng He, Ceylon”。據碑文所記年月為「永樂柒歲次己丑二月甲戌朔日」，則此碑乃立於 1409 年 2 月 15 日，乃鄭和（1371-1433）第三次下西洋（1407-1409），駐泊於錫蘭時為禮佛布施所留。此碑出土時，錫蘭尚為英國殖民地，隨後即由「皇家亞洲學會錫蘭分會」連繫英國駐北京大使館，寄交碑文拓片，請求解讀中文碑文。此一初步釋碑工作由在北京之漢學家 Backhouse 擔綱，在中國學者協助下完成。

首先發現此碑者為當地修路之工程師 Tomalin，他並將此碑送「可倫坡博物館」收藏。此碑今由斯里蘭卡「可倫坡國家博物館」永久典藏，是鄭和航海留在海外最珍貴文物中的無價之寶，也是該館唯一的一塊中國碑。

近年國際上對鄭和〈布施錫蘭山佛寺碑〉進行實物詳細考究，並發表論著者，就筆者所見，最重要者有兩種：

- 一、大隅晶子（日文）“ユロソボ國立博物館所藏の鄭和碑文について”。〔6〕
- 二、Era Negas(英文) “The Chinese Inscription on the Trilingual Slabstone from Galle Reconsidered”。〔11〕

大隅晶子論文對「鄭和碑」之出土、收藏、型制、石材、紋飾及漢文碑文等均有詳細考究，除列有漢文碑文全文之比勘外（略有誤），還有根據漢文轉譯之英、日文本。對另外兩種文字（泰米爾文及古波斯文）能認出者，也都附有日、英文之轉譯。由於古波斯文漫漶殘缺嚴重，能解讀之文字不多。

據拓所示，三種文字以漢文為主（直書），另二種文字橫書於側，「布施」品（奉納供物）基本相同，繁簡則有出入。大隅對供施品，分別作出了較詳明的解說，是一個重要貢獻，為日文鄭和碑研究重要參考。

Era Negas 之論文對「鄭和碑」做了更進一步的歷史考證，並比對了相關鄭和下西洋（1405-1433）時代的多種刻石，並附有中文原文、中文「漢語拼音」對照表及中文參考書目，十分可貴，為英文研究「布施碑」之最新成果。

最早公佈之全碑拓本，為 1917 年之 Perera [1]；最早讀解碑文之中文文本者為 Edmond Backhouse（1913，北京英國大使館翻譯，並在北大任教）[2]；Backhouse 因受到中國學者之大力協助，故能完成初步破釋。我國學者則以向達從倫敦大英博物館抄回碑文拓片，進行研究為最早（1959）[5]；日本山本達郎（1934，Yamamoto）[3]亦拓有碑文；西方學者進行研究者有多人，以法國大漢學家沙畹（1915，Charannes）[9]及伯希和（1933，Pelliot）[4]最早，最出名。

鄭和〈布施錫蘭山佛寺碑〉碑文中文部份，經筆者綜合勘訂全文如次。原碑直行陰刻，現改為橫列，並加標點，以利閱讀。筆者無緣見碑，謹依大隅及 Negas 等之勘校，加上個人之通解比對，訂定刻石中文為：

## 大明

皇帝遣太監鄭和、王貴通等昭告于佛世尊 曰：仰惟慈尊，圓明廣大，道臻玄妙，法濟群倫，歷劫河沙，悉歸弘化，能仁慧力，妙應無方。惟錫蘭山介乎海南，信言梵刹，靈應翕彰。比者遣使詔諭諸番，海道之開，深賴慈佑，人舟安利，來往無虞。永惟大德，禮用報施。謹以金銀、織金、紵絲、寶旛、香爐、花瓶、表裏、燈燭等物，布施佛寺，以充供養。惟 世尊鑒之。

總計布施錫蘭山立佛等寺供養：金壹阡錢、銀伍阡錢、各色紵絲伍十疋，各色絹伍拾疋，織金紵絲寶旛肆對，納：紅貳對、黃壹對、青壹對。古銅香爐伍個戩金座全，古銅花瓶伍對戩金座全，黃銅燭臺伍對戩金座全，黃銅燈盞伍個戩金座全。硃紅漆戩金香盒伍個、

金蓮花陸對、香油貳阡伍佰觔、蠟燭壹拾對、檀香壹拾炷。

峇永樂柒歲次、己丑二月、甲戌朔日謹施。

此碑湮沒數百年，可幸大體保存完好，是鄭和下西洋壯舉中最真實的歷史見證。全碑高 144 厘米、寬 77 厘米、厚 12 厘米，為輝綠岩岩質，石質略顯灰綠色。碑首雕有五爪雙龍，碑沿則為「唐草文」邊飾。下刻三種文字，中文居右，楷書陰刻 11 行，計 265 字；泰米爾文居左上，計 23 行；波斯文位左下，計 22 行〔11〕。碑文以中文為主，直書，兩種外文則由右向左橫書。此碑不大，高不及一人，在中國石碑中算是中型，但十分精緻，文彩煥然。碑體及紋飾皆明代風格，雖經歷了 600 年，仍引領觀者注目！但碑座已佚而不存。

此碑的三種文字，分別代表 15 世紀初錫蘭做為印度洋中一個國際大商港的文化背景。中文是碑主鄭和的母國文字；泰米爾文是當時錫蘭的通用文字；而波斯文則是當時海商貿易所使用的國際語文，目前除中文已解讀外，泰米爾文也已譯出〔12〕，對古波斯文譯解，則因碑刻漫漶，仍有相當難度。根據中文文本，已有英文轉譯本〔7〕及日文譯本〔6〕。

〈布施錫蘭山佛寺碑〉雖用三種不同文字，但布施禮品名單相同，「奉禮」對象則各不相同。當時錫蘭有三種不同宗教信仰，都有其特別意義。一種是佛教、一種是印度教、一種是伊斯蘭教，所以鄭和在中文碑文中所貢奉的是「佛世尊」（釋迦牟尼）；在泰米爾文中所貢奉的則為印度教的「神」（濕婆）；而波斯文中則獻給「伊斯蘭教之光」，也就是真主阿拉。這種審慎的安排，確實具有面面俱到的智慧，這可能也是鄭和七下西洋都能順利成功的一個原因。

鄭和出生於雲南昆陽（今晉寧）的伊斯蘭家庭，原姓馬，後因「軍功」賜姓「鄭」，父親馬哈只到過麥加朝聖。鄭和出生時即授予經名「三保」（Abdul Sabbur 之音譯，乃「真主之僕」之意），此即後世尊稱鄭和為「三保太監」的原由。後來將「保」改書為「寶」，形成了很大解釋上的混淆，其實「三保」就是鄭和（原姓馬）的經名（小名），乃由「阿訇」授予，此為伊斯蘭信仰習俗，可以確定。

鄭和第三次下西洋（實即印度洋），在抵達錫蘭前，曾經統一的島國已經分裂成三個敵對政府，以錫蘭人為主的政權掌握島嶼的中部，主要信奉佛教；來自印度南部的泰米爾人，信奉印度教，居於北部；而南部則多是信仰回教的阿拉伯人，三者常處於交戰狀態，鄭和的到達實處於危險情況，並發生了戰鬥，因戰勝才能繼續前行。

鄭和第三次下西洋於永樂六年（1408）9 月 28 日奉詔，於永樂七年（1409）12 月由閩江口五虎門開洋，於永樂九年（1411）6 月 16 日返回，乃第三次穿麻六甲海峽到錫蘭，並第一次越印度洋到波斯灣的忽魯謨斯。

鄭和在 15 世紀初葉的 28 年間（1405-1433），七下西洋，在海外各國「封山勒銘」、「布施立碑」多有，即使是「御碑銅鐘」、「碑亭鐘亭」也建了不少，但到了 600 年後的今日，能倖存者實在絕無僅有。而〈布施錫蘭山佛寺碑〉以鄭和伊斯蘭信徒的身份，禮

「佛」尊「神」，恰代表了當時東方三大宗教互敬的胸懷。此碑能歷劫不毀，也算得是「佛世尊」的天意，也可視之為「宗教互敬」先賢賞賜後人的歷史恩典。除「布施碑」外，在蘇門答臘最北端之亞齊另存有「鄭和銅鐘」一口，此鐘與福建南平「鄭和鐘」型制相同，應屬同時期鑄造，略晚於鄭和七航，由中國帶往當時麻六甲海峽西口要衝亞齊者，此鐘現存「亞齊博物館」花園中，建有鐘亭保護，也是無上珍品。

就碑論碑，因漢、滿、蒙、回、藏等均是我國文字，所以我國歷代碑刻中另有兩種外文者，實不多有，可以說鄭和〈布施錫蘭山佛寺碑〉是中國碑刻中的一大異數！鄭和〈布施碑〉不僅是鄭和航海歷史的見證，它也「見證」了 15 世紀初年中國與南亞國家間的海商貿易、宗教交流與歷史友誼。

此碑使用華南常用的硬質火成岩閃長岩，主要組成礦物為角閃石和長石，無石英，呈灰綠色，耐風化力強，不易磨蝕，故能保存 600 年而無大傷。依碑記時間為永樂七年（己丑）二月，顯然是在南京奉詔之後刻就，隨「寶船」前往錫蘭，並於布施後留於當地。

作者因無泰米爾文和波斯文知識，完全無由置喙，對整體碑額、碑文和邊飾也只看過複製照片，難以作進一步推敲，但對漢文碑文之通解，筆者自認雖不敢說完滿，但出現錯失之機率想已極小，但仍請海內外學者多多指教，使此歷史名碑能正確解讀流傳，有功於後世！

#### 註釋及參考文獻

- [ 1 ] Perera “The Galle Trilingual Stone” , Spaliza Zeilanica, 8:30 ( 1913 ) ,122-27。
- [ 2 ] Anonymous “A Chinese Inscription from Ceylon” , J.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. “, 45 ( 1914 ) ,171-172。
- [ 3 ] 山本達郎 ( Yamamoto, 王古魯譯 ) “鄭和西征考” , 文哲季刊, 4 卷 2 期 ( 1935 ) ,398-399。
- [ 4 ] Pelliot ( 伯希和 ) , Tung Pao《通報》, 30 ( 1933 ) , Paris, 237-452。原文法文 “Les Grands Voyages Maritimes Chinois au De’ butdu 15<sup>e</sup> Siecle” 。中譯本：馮承鈞《鄭和下西洋考》，商務，上海，1934。
- [ 5 ] 向達校注《西洋番國志》，中華，北京，1961。附錄二—（二）「鄭和在錫蘭所立碑」，50。
- [ 6 ] 大隅晶子 “ユロソぼ國立博物館所藏「鄭和碑文」について “，東京國立博物館研究誌，No.551，平成 9 年 12 月 ( 1997 ) ，53-72。
- [ 7 ] Joseph Needham “China, Europe and the Seas Between” , in Clerks and Craftsmen in China and the West》, Cambridge, 1970, 40-70。《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》, IV:3, 1971, Cambridge, 522-3。
- [ 8 ] 鄭鶴聲編《鄭和遺事彙編》( 1944 重慶初版 ) , 台灣中華書局，台北，1970 ( 台一版 ) , 89-90。
- [ 9 ] Chavannes ( 沙畹，法 ) , J, Asia (《亞洲學報》) , 1915, 第一冊，380。
- [ 10 ] 孫毅夫編著，攝影《從威尼斯到大阪》(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海上絲綢之路考察 ) ,

中國畫報出版社，北京，1992。108-9 ( 錫蘭山佈施碑彩圖兩幅，不清晰 )。

- [ 11 ] Era Negas “The Chinese Inscription on the Trilingual Slabstone from Galle Reconsidered” , 《Ancient Ruhuna : Sri Lankan-German Archaeological Proj,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》, Eds. H.-J. Weisshaar, H.Roth and W.Wijeya Pala, V.I (2001) , Mainz am Rhein : von Zabern, 437-68。
- [ 12 ] Paranaitana “The Tamil Inscription on the Galle Trilingual Slab” , Epigraphia Zeylancia, V.III, 1933。

漢文碑文之解讀 ( 龍村倪 , 2006,11 )

註 : 8 行 3,7 兩字 — 「阡」即仟、千 ; 10 行 18 字同。8 行倒數 10 字 — 「納」即內。11 行首字 — 「岢」即時。